知青岁月：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

近日，大型“青春励志剧”《知青》在央视热播，只播出短短数集，已引起了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那段岁月，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不堪回首”。

“无悔论”者说：“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这种苦难酿就成功的心态，是“青春无悔”的哲学基础，也是该剧“青春励志”的立足点。“有悔论”者们则说：“上山下乡”本就是一场苦难，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奋斗并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种认知分歧，实在引人深思。



2012-6-4 第 19 期央视热播剧《知青》剧照

所谓“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有一首知青诗歌这样写道：“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知青生活不美好，“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某些地方“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知青》 编剧梁晓声说，《知青》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他们想给观众看到真正的知青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被浪漫化、被规避掉“生活”。 《知青》只播了两集，我们无法判断梁晓声是否在信口开河。不过，目前已有不少资料披露了当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农村生活贫苦，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乡后一下子就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不适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农村的生活困难外，知青还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邓贤引用了大量官方档案描述了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残酷一面：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详细]

诚然，确实有部分知青是怀着某种理想主义去上山下乡的，但决不应该因为这部分理想主义，就遮蔽掉它背后的迷茫、苦闷乃至血腥。

知青们自己写诗说：“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让知青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让他们的后代、今天的人了解那一段历史，为人们注进精神营养，珍惜今天。这就是电视剧《知青》的价值。”某文艺评论家如是说。该看法十分有代表性。这种苦难成功学，在 90 年代相当流行。在 90 年代后期，当年的青葱少年变成大叔了，他们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来了“青春无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后悔。”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一场知青“青春无悔”的展览及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

网络上流传着一首署名为张愚若、张谷若两位知青的诗歌，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更荒唐的是：这种“无悔”还被人为提升到“与共和国共苦难”的高度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为人上人”，在我们的文化中“苦难”有着救赎的意义。知青称“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喊“青春无悔”，多少源于这种对苦难的解读。

然而，苦难对于知青来说，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一些知青认为“现在我们更能吃苦了，扛着共和国的苦难”，把个体的困难上升到“国家”层面。对此，刘亚秋在其《“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一文中分析：

“无悔被归因为‘与共和国共苦难’，换言之，我们‘扛’起了共和国的苦，在这里，无悔是通过个体的“苦”的意义转置实现的，即个体的苦提升为国家的苦难。”

“知青文学、公开聚会等权力运作将这种苦感提升为一种国家的苦难。于是，不管多么琐碎的‘苦’都变成了一种庄严的‘苦难’，为国家‘扛着苦难’。‘苦’不仅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且因此获得了一种国家历史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如此荒唐——他们浑然忘了，这种“苦难”是谁强加在知青们头上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赞歌。

“无悔青春”是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让人“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在 90 年代，大量的知青“怀旧”作品对往事魂牵梦萦、无限怀念，“无悔青春”成为热潮，随之也招来非议。郜元宝说“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及杂感汇编，知青作家自选集等，范围有限，不容易体现知青文学的全景与实绩。”

张严正也在《其知青图书开始走出误区》一文中批评知青中少数成功精英对知青岁月的眷恋，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一时间，多少知青看罢后，‘热泪欲零还住’，从而掀起了回首“无悔青春”的‘自恋情结’热潮。并引发了少数知青名人对黑土地和插队生活的眷恋、追忆和讴歌，从编写回忆录到筹办联谊会，从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电视剧中出现的知青出身的厂长、经理。……正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误以为知青一代的成功与辉煌和苦难与汗水有着必然的相关关系，更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详细]

高喊“青春无悔”的几乎全是知青中的精英，沉沦底层的知青是“沉默的大多数”

高喊“青春无悔”的几乎是知青中的精英，然而大部分没有话语权的知青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真实生活现状是怎样的？

《又说“老三届”》作者张地说：“据我所知，知青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很一般的水平，相当一部分还在为住房、子女、甚至为户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宁红岗则更为直接：“在扬起‘青春无悔’的漂亮大旗时，还应想想那些仍留在社会底层，没有机遇，没有能力，没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说些豪言壮语。”…[详细]

张地的描述较为笼统，在其背后，其实有很多鲜活的案例。譬如，知青回城后，为了生计奔波之余，他们成为城市边缘人，遭受歧视。某女知青说：

“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们到北京以后，人家不理解我们，人家排斥我们，其实我们原来是北京人，等我们下乡以后，他们就觉得把这些人赶走了，等这些人又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这些人抢了他们什么，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么心理，是觉得这些知青回来呢给他造成什么交通堵塞，你老农民似的。”

对于那些部分知青精英来说，他们高喊“青春无悔”，因为现在的成功了，可以从苦难中得到救赎，然而，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劳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来说，经历苦难后并没有迎来天堂，而是延续着另一种苦难，对于他们来说，青春真的无悔？或许那段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简单的“受苦”，并没有过多的意义。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受苦的不仅是知青，还有数亿农民

“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其实视线都局限在知青们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剧是：迄今为止，极少有人、有作品关注到“上山下乡”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体——农民——他们当年遭受了怎样的冲击。他们同样也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是苦难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知青文学”，他们也提炼不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更不懂得将个体的苦难提升到“与国家共苦难”的高度以获取心灵安慰，他们才是真正的失语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上山下乡让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

“上山下乡”，不仅牵扯着知青的命运，而且让整个家庭的陷入苦难的漩涡之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譬如：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的北京知青蔡连和，下乡三年后的第一次探亲就要结束时，其母亲脸上不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近乎恳求的挽留不成之后，埋头为他收拾行装时，突然倒在床上，顿时神智不清，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但已无回天之力。三年的苦熬苦盼，结局却是这样的凄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大声疾呼：天哪！世道对我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母亲可以给我一切，我却给了母亲了什么呢？蔡连和的眼泪哭干、心都碎了。”

许多知青存在各种婚姻问题，下一代往往成为这种家庭缺陷的牺牲品

知青回城，带着子女来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诸多问题，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长道路也不平坦。陈红在其《帮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碍的尝试》一文中谈及：

“他们有的寄居在亲戚家里，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倍感孤独；有的即使受到祖辈的疼爱，但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着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较为幸运，能随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于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压力造成烦躁，有时会转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于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头地，一旦孩子不争气，父母或怒骂或棒打，家庭气氛异常紧张，给孩子心灵造成很大压力；还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学习上不太适应，与其他同学在成绩上有明显差距，使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不如意不顺利都给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逐渐产生心理障碍。表现为：抑郁、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极的性格特征。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甚至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知青下乡给本就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农村造成了巨大负担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青下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据很多知青反映，当年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反而有时候把他们当成负担——自49年以来，农村一直是以一种单向度的“城市输血管”的身份存在着，农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最关键的“资本积累”；千万知青下乡，对本已不堪重负

的农村而言，绝对是经济负担的又一次加剧。但知青们似乎并不能理解这一点，相反，他们在农村的某些行为，今日读来令人寒心——李复奎在其《难忘的知青岁月》一文记载了当年知青偷社员的鸡，不偷反而会被人嘲笑：

“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社员家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丢了鸡的社员，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是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贫下中农’并不敢公然欺负。”

除了给农村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结语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对“上山下乡”的解读在今天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则是另一种更悲剧的悲剧。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事实无人能够否定：那是一场数千万人（知青）乃至数亿人（把农民包括进来）无法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运动；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犹如草芥。歌颂这样的运动，实在过于荒唐。

据说，梁晓声最终接下《知青》剧本，与一位官员的这句话有关：“作家应该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的确，作家需要承担责任。同样是面对“苦难”，彼岸的米兰·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附：

谢铁群：某些知青说“青春无悔”纯属自我安慰

2012 年 04 月 28 日 09:35 人民网谢铁群

[**导读**]“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当时我父亲看到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张贤亮也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



央视《知青》剧照

知青：自我安慰的“青春无悔”

知青离我很远，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浩荡展开之际，我还未出生；而当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这特殊的一页被历史翻过，我也还是学语孩童。知青又离我很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县城街头还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学老师里有定居在县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后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三届知青，务农十年，终于等到恢复高考，于 1978 年考入大学。

之所以想起知青这个话题，是因为手边这本邓贤著《中国知青梦》。这本出版于 1993 年、重印于 2003 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以丰富详尽的资料、细致深入的描写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曾在云南当过 7 年知青的作者为写这本书行程 3000 公里，亲至 25 个知青农场，查阅大量文书档案，采访了从各地各类知青到省市领导的许多当事人，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千家万户、改变共和国社会历史轨迹的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读罢该书，一股一言难尽的复杂况味久久充溢心头。

一

不管是知青自己，还是旁观者，都把知青称为受苦受难的一群人、一代人，他们高中或者初中毕业，正是学习知识的黄金阶段，却被抛出校门和城市，到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远离日夜思念的亲人，也远离本应属于他们的知识文化。当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投身计算机引发的科技革命之际，2000 万

中国知青却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凡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及其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记忆乃至终身遗憾。

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或卷入这场明显伤害他们权益的运动的？我想肯定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者有三种：一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真诚地响应上面号召，准备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的；二是家庭出身不好，希望以积极下乡的“觉悟高”表现换回政治地位和其他应有利益的；三是家里太穷，离家下乡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这三种人有主动性、目的性，但后两种其实也是被迫，到农村落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我们来看看出于“革命理想”的那批人。许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理想”和“激情”还被新一代人崇敬和向往。可是，他们的那种高昂状态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知青梦》里写到了第一批主动要求支援边疆的北京知青，因人数是 55 人，故以“北京五十五”的名号闻名云南全省。这批人在西双版纳安家以后，一个女知青在日记里写道：“一想到今天我们开荒种地住草房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男知青在家信中这样说：“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格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看着这些庄严铿锵的字句，今天我们只会哑然失笑：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修反”什么时候以“一两橡胶籽一两黄金”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过？他们的所谓“理想”、所谓“激情”、所谓“沸腾的热血”，不过是少不更事者上当受骗的产物！

在全国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约 2000 万知青中，主动参与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试问：谁不愿意读书，而要去种田呢？谁不愿呆在城市，而要去农村呢？《中国知青梦》没有多写这项政策是如何执行下去的，但另一位也有知青经历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其一篇散文里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史铁生对后生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知青下乡是自愿的，“您可一个字也别信”，他描绘了一位作动员知青下乡工作颇有“心得”的干部来他们学校动员时的情景：学生对上山下乡抵触畏惧、议论纷纷，该干部上主席台后第一句话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第二句话是：“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这就是“动员”，这就是“工作方法”，纯粹是地痞无赖式的恐吓加逼迫！强权高压下，列车汽笛一响，泪雨滂沱，2000 万知青弃学离家，散落到 960 万平方公里的山野田原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政策到底是何目的，今天已可看得很清楚。知青下放大规模展开于 1968 年，文革已历两年，发动者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革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他们被煽动起来的高昂“革命热情”又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必须使他们转向，把他们的劲头用“战天斗地”、“大有作为”、“支援边疆”

等堂皇口号引向农村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已尝到了“无法无天”的甜头，还得抑制其太盛的气焰，便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降低他们的地位，便于管控。另外，文革开始后经济急遽衰退，城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口，上山下乡的另一目的就是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出去，减轻城市经济压力。当时的一个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泄露天机。

也许当时浑然不觉，若干年后知青明白过来后不知是何心情：狂热地参与了一场运动，又立即被这场运动抛弃，一腔热血只是做了工具，用完即抛，人生苦难从此开始。

二

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对知青艰苦劳动的描述倒不一定格外醒目，因为让城市学生去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其不适应可想而知。最叫人触目惊心的，是以落户在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知青所受到的管制和欺凌。这些以前在社会上也有所流传，比如我的家乡就传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借批准知青回城的权力逼迫两个女知青和他一起洗澡，然而更多事情毕竟不为人所知。在书中，邓贤整页整页地大量引用最可靠的官方文书档案，让那血腥、肮脏、恐怖的一幕幕重见天日。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

……

在这密密麻麻的罪恶记录里，我还发现一个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离谱的案例：“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邓贤还采访了一个当年因犯“男女问题”而受处理的退伍军官黄万全。已 53 岁的黄万全竟然说：“这种事，不大说得清楚是谁的错……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他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他还感慨：“谁叫咱们那时候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

为了批一个探亲假之类，就要付出肉体和廉耻的沉重代价！掌权者还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可耻的罪犯！

如果这只是犯罪者强词夺理的狡辩倒也罢了，我特别不明白的是，邓贤到底出于何种考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辨证分析”，以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来证明这些罪行“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而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包括被李先念点名枪毙、恶贯满盈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等人，“如果没有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们也是“好好的同志”！读到这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为什么不说他们原本就是坏人，只是未得势的时候其真实思想品质没有表现出来呢？！坏制度下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只会变成魔鬼。“老子窝囊了二十年，X 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强奸女知青 20 余人、猥亵侮辱女知青上百人、捆吊毒打男知青 70 余人（多人致残）的蒋小山的这句心里话，不就是大明大白的自证吗？任何行为当然都有其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据此就可以把滔天罪行都推到“时代”和“体制”上去，那人间还有正邪、善恶和黑白的界限吗？！

震天响的“革命口号”之下，禁欲主义的社会氛围之中，红色潮流席卷的中华大地，人间罪恶一样不少。今天向往那个时代“理想”、“激情”、“廉洁”的年轻一代，看了以上关于知青生活的列述，该做何感想？我要说，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还有很多令人不满甚至愤怒的方面，但比起那个时代，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改革开放刷新了中国面貌，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因对现实不满，一些人——而且多是有些年岁的人——开出的药方竟是回到过去，不知是何脑筋。

《中国知青梦》中还记叙了知青生活中大量可怕的事故，有夜间失火把十位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的女知青烧成一堆焦碳的，有一场台风过后海面浮起数百具保护拦海大堤的知青尸体的，有一次草原失火烧死知青六十九名的，有不懂炮弹知识而去排除哑炮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有女知青生孩子时庸医醉酒而致母子双亡的，有扛毛竹下山被弹到山涧里摔成一堆“零件”的，有开荒误触蜂窝而被蛰得通体肿胀而死的，有雨夜出门上厕所失踪至今尸骨无寻的……史实历历，不堪回首。

三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当年的知青不少已人到中年，已进踏入成熟人生的他们开始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这时知青界的一个口号、或曰一种态度掀起了一场波澜——那就是"青春无悔"。

1991 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

"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当时我父亲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年长他们一辈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观看展览的一个研究生说得更为犀利：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这次展览中，在"青春无悔"的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里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提出"青春无悔"者也许在新时期以后事业发达，因而感谢知青经历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了解了国情和社会。可是，今天的成功跟知青生涯真的有因果关系吗？知青人数达 2000 万，发达者又有几人？多数本应有所作为的人还不是被下放毁去理想，成为为生计无奈奔波的底层一员吗？也许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有刻骨的感情，不愿承认自己的美好年华成为了特殊时代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我们年轻时也在祖国大地上挥洒了汗水！可是，你又能说自己的青春有何价值？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 20 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 80 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 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是 100%！还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壮举"，美好的青春事业献给了违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荒唐举动，这究竟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如此青春，竟然无悔，你们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

这些话也许太过残酷。对"青春无悔"的最佳阐解，是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诗，作者是署名张愚若、张谷若的两位知青。这首诗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说青春无悔

是因为无何奈何

要自我安慰

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作为幸运地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一代，让我们为这些长辈献上一份真诚的理解吧！

四

知青是不幸的，但不是最不幸的，至少他们还拥有社会的同情悲悯，而且他们最终也都脱离了农村的体力劳动和单调困乏的环境，不管此后生活有多不如意，毕竟不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了。最底层的是农民，在很多地方，他们依然过着知青当年不顾一切要摆脱的那种生活。因为知青的人生和命运曾经在一个阶段和农民重叠，二者比较，也成为一个引起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1980 年代，“知青文学”兴盛，涌现出梁晓声、王安忆、叶辛、阿城等一大批知青作家。就在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才华，夸他们“知青的苦没白吃”之时，出身农村的贾平凹淡然、简洁而富有震撼力地指出：“知青吃了一点苦，所以写了很多东西；农民吃了很多苦，所以什么也没写出来。”的确，知青出生在城里，被赶到农村过了几年十几年农民生活，就是时代荒谬、社会不公，可以用文学作品反复诉说苦难并获得同情和尊敬；农民生在农村，过那样的生活是一辈子，是祖祖辈辈，他们的诉说有谁去听？难道农民就是活该吗？

《中国知青梦》中最感人的一节是知青在 70 年代末为取得回城权利而做的殊死抗争，下面的情节曾被多家报刊节载：当时知青为回城的请愿活动风起云涌，国家派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鲁田前去安抚。对话会上，鲁田坚持“不得返城”的当时政策，而知青不顾一切坚决要回城，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一位瘦弱的成都女知青缓步走向土搭的主席台，正要开口说话，却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鲁田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顿时三万知青一齐跪倒，撕心裂肺的哀鸣响彻长空大地。鲁田也为之泪流满面，此事对推动知青回城起了很大作用。读到这里我感动不已，但过后不禁又想到：知青受不了农村生活可以请愿，可农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向谁哭求去？有哪个“好伯伯”会来“救救”农民呢？答案就是那个冰冷而又雄辩的“谁叫你生在了农村”吗？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出身不同，命运差别竟如此之大，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吗？把这种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又能算现代国民吗？

《中国知青梦》一书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知青的，把知青放在受难者的定位上。作者是知青，是文化人，也是城里人，这三个视角下的知青都是受难者，是可怜人。而这三个视角之外，还有一个观照角度，那就是农民。从一些资料来看，农民对知青虽然首先也是同情，但他们的感触要多得多。知青下乡，一些农民敏锐地感到这是“和我们争口粮来了”，当时城市经济衰退，农村难道就好？肩膊稚嫩的城市中学生来到农村不但不能增加生产力，

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知青说起来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给农民带来的礼物是让农民可能又多一个新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知青在农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农村人根本惹之不起。籍贯安徽望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一文里对此有生动描述和深刻分析。

中国城乡阶层之间隔阂很多，如果几千万城市知青的下乡，增进了这两大社会板块间的沟通和理解，倒也不失为幸事，可结果如何？虽然也见到过知青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的感人场面，以及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但总体上，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几千万人的城市“移民”运动在弥合中国城乡间的鸿沟、增进阶层交流上没有发挥作用，在社会心理上，这依然是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回忆起当年一伙四川知青偷走一个农民的卖猪钱，致使该农民上吊自杀身亡，而多少年后这伙知青居然是用津津乐道的口气笑谈这件往事！徐友渔感慨地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案例是极端的，但反映出的现象却是普遍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达几年十几年，也并没有让城乡两个人群的感情苦乐相通，融合一体。在知青文学中，以及知青对农村的回忆文章里，当年知青们也常赞美农村风光，回味田园生活，同情农民疾苦，但那只是重新进入了城市壁垒的“城市贵族的乡村遥望”……

五

作为历史的一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被永远翻过，知青这个名词在今天也已经显出历史沧桑感。但这个历史名词承载的故事叙说不完，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悟也无穷无尽。看到我们在对他们认真地论说指点，头发已开始斑白的知青们会投来一个约略含笑的目光，

说：对，知青，一言难尽。

知青图书开始走出误区

2012 年 06 月 04 日 03:04 光明网张严正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30 周年之际，今年知青书籍出版也是多元化，有诗集、画册和系列套书等。近期，以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评析那场“无法抚慰的岁月”的理论作品也相继面世，使知青文学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

中央党史出版社现已出版《狂飙——红卫兵童话》、《涅槃——老三届新语》、《尘劫——老三届朝歌》。北京出版了张凯的《又说“老三届”》，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金大陆的《命运与世运》。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跨世纪对话——第三、四代人的心灵对白》，书中从深层次对知青一代人进行了综合性立体剖析，并涉及到一些较敏感和有争论的话题，诸如“知青贵族”、“拍卖苦难”、“68 年人”等；并指出“应结束青春无悔的神话”和

“老三届人存在的思想误区”，其中也不乏偏颇之见。可以说，目前，知青文学正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为理论导向，逐渐开始较真实地客观评价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并结束以往的回忆录式的模式，以新的面孔向亿万读者走来。

知青文学，它既不同于“伤痕文学”对苦难和伤痕的抚摸与哭诉，也有别于“反思文学”对极“左”路线的反思与批判，它包含着远为复杂的精神指向。然而，近 10 年来，大量的知青“怀旧”作品畅销一时，情调或低回婉转，或慷慨激昂，对往事魂牵梦萦、无限怀念。让“文革”的历史变得雾里看花、模糊不清。

“怀旧”起源于 90 年 11 月，北京知青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一时间，多少知青看罢后，“热泪欲零还住”，从而掀起了回首“无悔青春”的“自恋情结”热潮。并引发了少数知青名人对黑土地和插队生活的眷恋、追忆和讴歌，从编写回忆录到筹办联谊会，从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电视剧中出现的知青出身的厂长、经理。看似风风火火，实则浮光掠影，而令人遗憾的是竟难以见到些许的反思的激情和批判的光芒？

正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误以为知青一代的成功与辉煌和苦难与汗水有着必然的相关关系，更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对此，有人认为：“（个别人）对苦难历程的诗化神化圣化，实际上是对一代人真实精神的轨迹的集体篡改，是一次牟取精神暴利的自欺欺世的精神拍卖活动。”“今日的成功，使他们可以安全而轻松的回眸遥远的北大荒，与其说是一种感伤的怀旧，不如说是一种炫耀、一种奢侈。”更有人将部分知青作品与张贤亮、从维熙写的那些诗化苦难的小说相提并论。就此现象，《中华读书报》目前发表文章《知青图书的误区》，指出这是一些出版者推出的“知青名人市场效应”，是“打着知青的幌子赚钱”，应该还历史以真实。张凯也坦率地说：“据我所知，知青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很一般的水平，相当一部分还在为住房、子女甚至为户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因为他们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他们没有发表观点的条件。

“对青春无悔”的观点，也有不少媒体都曾进行过专栏讨论，认为“青春无悔”是观点上的一种异化现象，是对历史的嘲弄。至今仍留在内蒙的知青作家肖亦农面对有的作家对知青生活一咏三叹，依恋不已时说：“我宁可不当作家，也不要那份苦难。”宁红岗则说：“在扬起‘青春无悔’的漂亮大旗时，还应想想那些仍留在社会底层，没有机遇，没有能力，没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说些豪言壮语。”岁月无情，一代知青也将完成自己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在暮色苍茫中，它将成为当代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匆匆过客。然而，它留给后人的，应是一部真实的知青“史记”。或许，我们一代局内人难以将其写好，相信我们的后代会完整地将其付诸于世。